

# “憩园”中的万千风景

## ——近20年巴金作品的海外传播与研究

周立民

2020年是巴金逝世15周年。作为一代文坛巨匠，其作品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，也从上世纪40年代传播海外开始，让世界读者看到了一个古老中国的衰落、青春中国的新生，看到了奔向现代化的民族炽热的追求。

随着巴金这一辈作家开始走入“万神殿”，成为经典作家，其作品的翻译、传播以及对作家本人的研究，已经常态化，不会再像以往那样形成某种热点、潮流，用巴金的作品名来形容就是：不再有“激流”，却迎来了“憩园”的风景。“憩园”，少了波澜，多了深入细致的体会、观察和琢磨，呈现出万千风景。

### 海外影响依然强大 重印新印生机勃勃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形成了一个巴金作品翻译高峰，他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中的代表作不仅有众多语种的不同译本，比如《家》就有40多种外文译本，甚至还出现一部作品同一语种不止一个译本的情况。以日文译本为例，《家》有两种，《憩园》有3种，《寒夜》有4种译本；西班牙语译本《家》有两个译本；韩文版《家》有3个译本……在主要语种已有相当数量译本的情况下，如果仅从数量上看，巴金作品的海外翻译仿佛处在下降状态，然而对这个背景有所了解之后，再回过头来观察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巴金作为经典作家的持续影响力仍然很大，而且就作品外译而言，近年来正向纵深的腹地“开疆拓土”。

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巴金的重要译本被重印，二是一些过去未译过的巴金作品或过去未曾涉及的语种，开始了新译本。前者有法译本《憩园》，都白(Nicolas Chapuis)、戴鹤白(Roger Dar-ro-bers)合译，1979年初版后，又于2005年推出第三版；英译本《第四病室》(孔海立、葛浩文译)，1999年初版，2005年重版。日文译本的巴金经典作品近年也相继重版，都收入到具有广泛影响的岩波文库。《寒夜》(立间祥译介)最初收入集英社1978年出版的《世界文学全集》中，2016年，岩波书店又将其收入“岩波文库”重印；《家》(上下两册，坂原邦译)岩波文库版1956年问世后，到2019年2月，已重印8次……一个作家的生命力存在于他的作品中，存在于读者的阅读中，译本的不断重印恰恰说明了巴金作品在世界读者中持久的生命力。

以往不太被注意的小说作品推出了新译本。如德文有《田惠世》问世，大春(Alexander Saechtig)翻译，香港作家书局2012年出版。韩文版则开始关注巴金的短篇小说，学者朴兰英近年翻译了《爸爸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》(创作与批评社2016年版)、《巴金小说选》(阁楼院2004年版)两部短篇小说集，分别收录《狮子》《爱的十字架》《我的眼泪》等13部短篇作品以及《狗》《将军》《化雪的日子》等作品。

### 翻译瞄准不同文体 传播更多小语种地区

小说之外，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《巴金自传》(May-lee Chai译)。法国巴黎东

方语言文化学院(INALCO)研究生索菲·阿克蒂斯尼2001年翻译了《随想录》第二集《探索集》；2006年，韩国首尔金牛座出版社(Taurus Books)出版了韩文版《随想录选集》，书名《鹰之歌》，译为洪suk-pyo、李kyung-ha、jung-haeng，共选取《随想录》中51篇文章译出。这些翻译都改变了过去巴金作品在海外译介以小说为主的局面，面向巴金创作多元拓展，对于了解巴金思想和创作全貌意义重大。

在语种拓展方面，《寒夜》韩文译本2010年出版，《憩园》韩文译本2014年出版。《家》有了西班牙语新译本，由巴塞罗那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——小行星之书店出版社2014年出版，成为当年马德里书展上最畅销的一部外语作品。怀着对中国文化和巴金作品的热爱，在近15年里，欧拉利亚(Eulalia Jardí)将《家》《春》《寒夜》译成加泰罗尼亚文，在西班牙出版，是巴金作品海外传播令人欣喜的收获。其中，《家》由巴塞罗那那维也纳出版社2011年出版，收入该社“当代经典”丛书。这套丛书共收入了普鲁斯特、毛姆、T·S·艾略特等众多20世纪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。《家》是该社第一次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，吸引了媒体广泛报道和评论。欧拉利亚翻译的《寒夜》《春》，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出版，她现在正在为《秋》的翻译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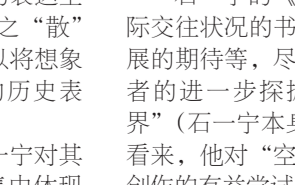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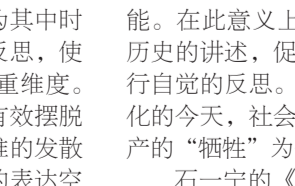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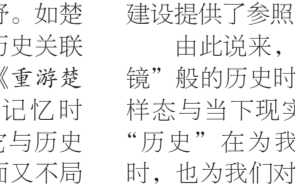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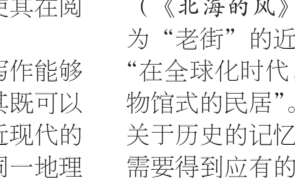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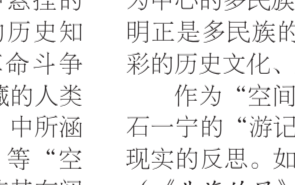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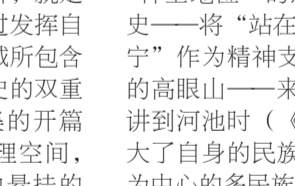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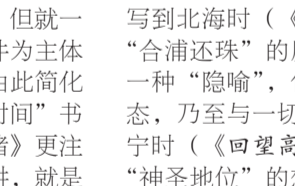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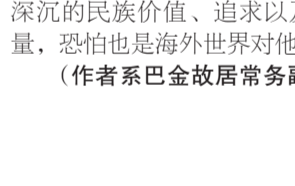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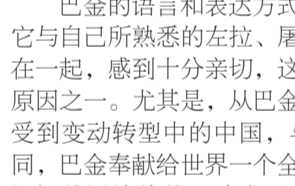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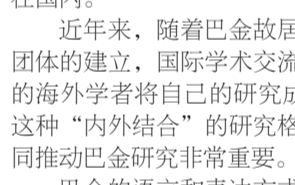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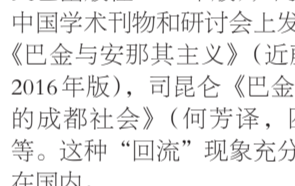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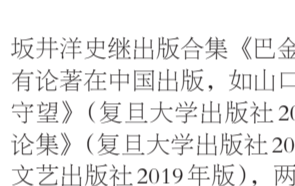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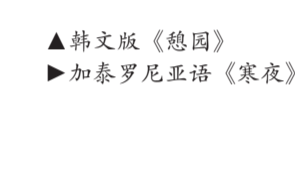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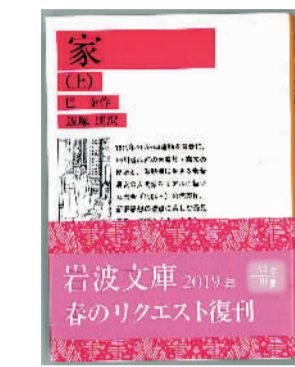
### 研究成果回流国内 形成中外携手新格局

在巴金研究方面，近20年来海外学者在稳步前进中也有积极开拓：研究的作品范围不断扩大；由作家生平传记研究，拓展到思想领域等各个方面；由巴金的个案研究，拓展到将巴金放在更广阔的文学史和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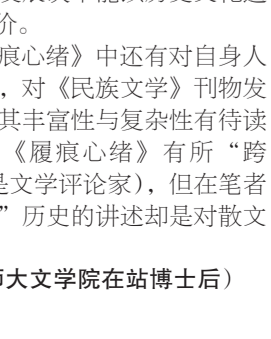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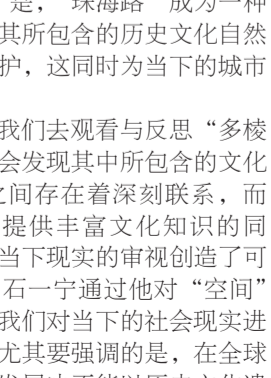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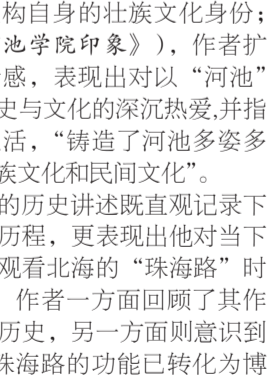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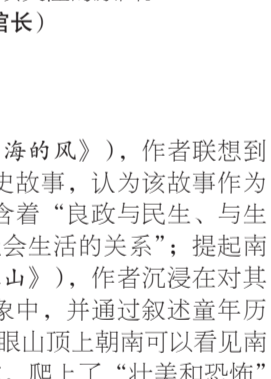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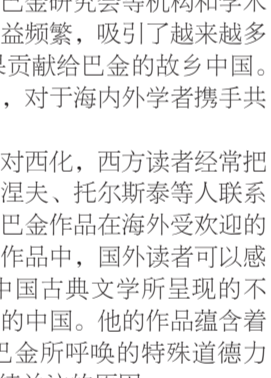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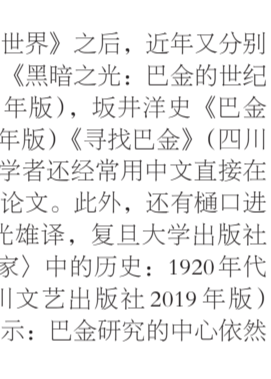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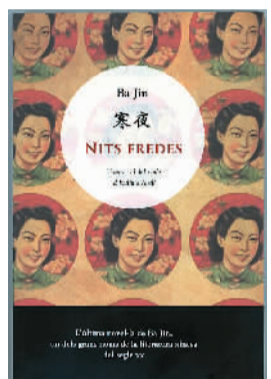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始终有一批稳定的研究者队伍，他们是推动巴金研究活跃开来的力量，也代表着海外巴金研究的水准。如日本学者山口守、坂井洋史、新谷秀明、河村昌子、近藤光雄等，韩国学者朴兰英、李喜卿等，法国学者安必诺，美国学者司昆仑等。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，仅以专著而言，就出版有：朴兰英《巴金传》(韩国HanWool Academy2006年版)、河村昌子《巴金：贯穿其文学的要素》(日本中国文库株式会社2016年版)、司昆仑《虚构中的事实：1920年代的中国与巴金的〈家〉》(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)、李喜卿《巴金的〈随想录〉与1980年代中国社会》(韩国全南大学出版文化院2018年版)、山口守《巴金与无政府主义：理想主义的光辉和阴影》(日本中国文库株式会社2019年版)。此外，安必诺对巴金致明兴礼书信的完整发掘和研究，也是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。

其次，由于作家的地位和贡献，巴金成为海外多位研究者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，他们或专论巴金个人，或在论文中设有专章，如2008年犹他大学卡尔·蒙哥马利的学位论文是《论激流：巴金的〈家〉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》。此外宋明炜、冯进等人的博士论文中均有涉及巴金的专章。

第三，海外学术成果开始回流巴金故里，或称“逆输入”。巴金作品不仅传播海外，而且这些海外研究成果又比较集中地登陆中国，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，这也是近年巴金研究比较突出的现象。日本学者山口守、



▲日本岩波文库版《家》  
▼河村昌子著《巴金：贯穿其文学的要素》



作者近照

## 岁月礼敬

陈涛

在我住处窗外有两棵几十年树龄的高大核桃树，夏日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我刚去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时，午后经常坐在树下窄窄的石阶上。村民与镇上的干部不时从身前走过，认识的便打个招呼，或者起身攀谈一会，但更多时候还是端坐在那里，透过枝叶与楼顶间的小块天空向远处望去，注视着朵朵白云缓缓飘过，或者根据形状将它们想象成一座山、一只羊、一匹马、一个人。这样的情景在此后两年的时光中反复出现，如果说自己那个小小的房间是我思考的地方，那核桃树下就变成了我放空的存在。

任职村“第一书记”的日子总是很忙碌，并且随着融入的时间越久，事情也愈发繁杂。在北京待久了，进入基层如同跌入一个失重世界，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。基层如同神经传输的末梢，似乎只能在永恒的被动中尝试构建起自身的主动性。

当我任职8个月时，诸般生活与工作的况味时常袭来，令我欢呼雀跃，引我唏嘘感慨。文学，在我心目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。于是，当我又在核桃树下闲坐的某个时刻，我突然起身回屋，打开电脑，写下了《山中岁月》一书中的第一篇文章《另一种生活》。

从写下第一个字开始，我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环境与工作的记录，我试图去穿透生活的表象，在展示不同群体的形象中努力思考复杂的人性，揭示永恒的困境。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，我看到农民的良善、朴实、上进，也尝试去理解他们身上的不足与缺点；我看到乡镇干部的辛苦与无奈，并为之而心疼，但也会批评他们的固执与偏见。在基层，在农村，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如同冰山一角，牵扯到的是海面下的巨大存在。我不敢轻易判断一件事的对错，也不敢轻易判断一个人的好坏，唯有以一颗悲悯之心小心翼翼地对待并努力扛起肩上的担子。

我任职期间及之后，写了16篇文章，里面有对地方人文风景的描述，如《甘南漫行》《浪山》等；有对扶贫工作的记录与思考，如《修道》《山上来客》等；有自己所做的助学活动以及对乡村教育的思索，如《从图书馆到助学路》；有对远方、家人朋友的想念，如《不可念》《时光杂记》等；有对当地村人以及镇政府年轻人生活境遇与内心的描摹，如《小镇青年、酒及酒事》《牛人何暖阳》等；还有自己对这份工作生活的梳理与深切反思，如《生命中的二十四个月》等等。

在山村生活的日子里，远离家人与朋友，孤独如影随形，无数次屋外狂风席卷着核桃树的枝条，抽打着门窗，或有大颗的雨滴在玻璃上叭叭作响，而我孤身一人伏案写作。是写作给了我安静下来的力量，在读书与写作中，我学会了享受孤独，充盈内心，而这些也都会流露在《山中岁月》的字里行间。

这些文章见证了我的青春，铭刻着岁月的痕迹。一个人，能够参与到脱贫攻坚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当中，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之付出，何其有幸。我在作品中以个体的视角与思维，通过不同角度与面向记录并展示了自己两年来的工作、生活以及复杂的心路历程。我想这本书也会引起很多在全国各地奋战的“第一书记”们的共鸣，他们或许会从中看到自己认真体验生活，转变固有认知，破除刻板印象，拥抱莫测变化的成长与担当，这里面不仅有我，还有我们这群人的理想与青春。我们有过迷惘与彷徨，有过脆弱与失望，但更多是始终如一的坚定身影。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编辑)



### 刘一达散文集《典故北京》出版

本报(记者张鹏禹)近日，“京味作家”刘一达散文集《典故北京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作者积20多年心血采访创作的有关北京人文历史的最新散文集，分为上半部分“引经据典”42篇，下半部分“谈天说地”11篇。

在刘一达眼中，谈典故其实就是讲古话旧。书中，作者探寻老北京“三山五顶”“五大镇物”，趣说造办处与“燕京八绝”，回溯京城牌匾逸事、镖局往事等，以地道的京味儿语言，钩沉数百年人文掌故，对时代变迁的感悟与反思深藏其间，体现了作者为北京历史文化存照的理想。

### 影视文学剧本《楚天风云录》首发

本报(胡雪慧)近日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影视文学剧本《楚天风云录》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发。该书讲述了被百姓誉为慈父母的地方官——春秋末期楚国政治家、军事家叶公沈诸梁一生的丰功伟绩。在叶县，他兴修水利，惠恤万民；法理治国，推行教化；勤政亲民，举贤让贤。孔子曾专程拜访叶公，看到叶县繁荣和乐的景象，提出“近者来，远者来”的社会治理理想境界。作者叶树奇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，以现代历史观撰写上古史事，力图呈现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智慧。

### 编辑荐书



钱锺书选读 杨绛译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1983年到1991年间，杨绛鼓励丈夫钱锺书独立选一部唐诗给自己看。钱锺书以《全唐诗》为底本，每天选几首，杨绛每日抄录，作为品读唐诗和书法习字的“日课”。钱、杨伉俪的这一唐诗选录，最终形成9册手稿。2020年11月21日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纪念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近40年的唐诗选手稿整理校勘，增加诗人小传和必要注释，以《钱锺书选读唐诗》的面貌出版。

该书共选录308位诗人、1997首(句)作品，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唐诗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，体现了钱锺书选读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，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。此外，杨绛在抄录手稿时留下的日期、诗歌评论、书法评论、生活杂记等，也体现了钱杨夫妇的品评互动，使读者得以了解到两位学人隽永美好的诗书生活。

### 新作评介

## 讲述作为「空间」的历史

读石一宁散文集《履痕心绪》

张凯成

在当代文坛，历史散文并不少，但就一般作品而言，以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为主体的“时间”书写占了较多比重，也由此简化了“历史散文”的复杂性。相对“时间”书写而言，石一宁的散文集《履痕心绪》更注重书写作为“空间”的历史，通俗讲，就是以现实性的地理空间为发散点，通过发挥自身丰富的历史想象力，来讲述该地域所包含的多元历史文化，并经由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叙述，形成自身的特点。如散文集的开篇《岳麓的雨》以“岳麓书院”为地理空间，渐次呈现岳麓书院的由来以及其中悬挂的“潇湘榭市”“实事求是”等匾额的历史知识。此外，“凌云”中所包含的革命斗争(《凌云行思》)、“尧庙”中所蕴藏的人类文明进程(《尧庙幽思》)、“楚雄”中所涵括的古人类文明(《重游楚雄》)等“空间”历史，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使其在阅读中得以回看中国历史文化。

以“空间”历史为核心的散文写作能够摆脱固有“时间脉络”的掣肘，使其既可以包蕴悠久的古代文明，又可以容纳近现代的广阔风貌，同时，二者又能交汇于同一地理空间之内，据此形成开阔的写作视野。如楚雄的“元谋”历史与金沙江的长征历史关联起来，形成特殊的历史文化景观(《重游楚雄》)；在讲述有关“上林”的记忆时(《上林忆想》)，作者一方面将它与历史人物“徐霞客”连接起来，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对徐霞客过往经历的书写，因为其中时常穿插着关于“历史遗忘”的现实反思，使得这种讲述包含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。可以说，选择地理空间作为焦点，有效摆脱了“线性历史”的束缚，在写作思维的发散与想象力的生产中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。同时，这种写作正契合了散文之“散”的内在特性。因为“地理空间”可以将想象力集聚起来，从而生成更为多元的历史表达。

在散文集《履痕心绪》中，石一宁对其“壮族身份”有着自觉的认同，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广西“空间历史”的讲述上。比如在

写到北海时(《北海的风》)，作者联想到“合浦还珠”的历史故事，认为该故事作为一种“隐喻”，包含着“良政与民生、与生态，乃至与一切社会生活的关系”；提起南宁时(《回望高眼山》)，作者沉浸在其“神圣地位”的想象中，并通过叙述童年历史——将“站在高眼山顶上朝南可以看见南宁”作为精神支撑，爬上了“壮美和恐怖”的高眼山——来塑造自身的壮族文化身份；讲到河池时(《河池学院印象》)，作者扩大了自己的民族情感，表现出对以“河池”为中心的多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沉热爱，并指明正是多民族的生活，“铸造了河池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、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”。

作为“空间”的历史讲述既直观记录下石一宁的“游记”历程，更表现出他对当下现实的反思。如在观看北海的“珠海路”时(《北海的风》)，作者一方面回顾了其作为“老街”的近代历史，另一方面则意识到“在全球化时代，珠海路的功能已转化为博物馆式的民居”。于是，“珠海路”成为一种关于历史的记忆，其所包含的历史文化自然需要得到应有的保护，这同时为当下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参照。

由此说来，当我们去观看与反思“多棱镜”般的历史时，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样态与当下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，而“历史”在为我们提供丰富文化知识的同时，也为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审视创造了可能。在此意义上，石一宁通过他对“空间”历史的讲述，促使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行自觉的反思。他尤其要强调的是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社会的发展决不能以历史文化遗产的“牺牲”为代价。

石一宁的《履痕心绪》中还有对自身人际交往状况的书写，对《民族文学》刊物发展的期待等，尽管其丰富性与复杂性有待读者的进一步探掘。《履痕心绪》有所“跨界”(石一宁本身是文学评论家)，但在笔者看来，他对“空间”历史的讲述却是对散文创作的有益尝试。(作者系华中师大文学院在读博士)